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 HERMES

沃格林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 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著

## 政治观念史稿·卷四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修订版)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IV)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孔新峰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沃格林集

刘小枫 ● 主编

# 政治观念史稿·卷四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修订版）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IV)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美] 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著

孔新峰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 (美)沃格林(E. Voegelin)著;孔新峰译. --修订本.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政治观念史稿;卷四)

ISBN 978-7-5675-8103-6

I. ①文… II. ①沃… ②孔… III. ①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2644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沃格林集

## 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修订版)

- 著者 [美]沃格林  
译者 孔新峰  
责任编辑 王旭  
封面设计 刘怡霖
-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ebs.tmall.com>
-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1  
印张 13.75  
字数 255 千字  
版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8103-6/B.1147  
定价 78.00 元
-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D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 “沃格林集”出版说明

沃格林(1901-1985)出生于德国古城科隆,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后来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博士期间攻读的是政治学,沃格林喜欢的却是哲学和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心目中的偶像则是当时的学界思想泰斗韦伯。不过,沃格林虽荣幸做过凯尔森的助教,后来却成了自由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者之一。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博士毕业即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访学美国,回国后写下处女作《论美国精神的形式》(*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沃格林流亡美国(1938年),数年后在美国巴吞鲁日市(Baton Rouge)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谋得教职(1942年)。

此前沃格林曾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要为大学生撰写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简明教科书。但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即便如此,他仍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这个写作计划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最终废置,变成一堆“政治观念史稿”。

废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不仅仅是“卷帙过大”，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打破这种现代式学术藩篱，仅就这一点来说，这部“史稿”不仅对西方学界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依笔者陋见，在林林总总的各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经后人整理的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最为宏富、最富启发性，剖析我们关切的问题，迄今无出其右者。

沃格林觉得，即便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已经显露出种种凶相的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废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沃格林以政治思想史方式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究时，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他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

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符号”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更为根本。于是他另起炉灶，大量运用“史稿”已有材料，撰成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以及其他重要文集。我们会感到奇怪，如今的《政治观念史稿》何以从“希腊化时期”开始，其实，此前的材料大多被用来撰写《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了。

沃格林启发我们：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而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正是我们可能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废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1951年,沃格林应邀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次年,讲稿以“新政治科学”为题出版,成为沃格林思想成熟的标志。随后,沃格林全力撰写多卷本《秩序与历史》,时有其他专题文集问世。1958年,沃格林返回德国,执教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并创建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然而在战后的德语学界,沃格林的学问几乎没有留下影响痕迹,这着实令人费解。退休以后,沃格林再度赴美,继续撰写因各种事务而搁置的《秩序与历史》后两卷。

在思考世界文明的历史性危机方面,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无疑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在笔者看来,二人精深的哲思和广袤的视野,西方学界迄今无人能与比肩。

沃格林去世后,他的美国弟子着手编辑《沃格林集》,成34卷。除五卷本《秩序与历史》和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外,还有六卷《已刊文集》(*Published Essays*),以及其他自编文集和未刊文稿。沃格林学述将艰深的现象学思辨与广博的史学视野融为一炉,汉译殊为不易,译者极难寻觅。我们只能耐心等待胜任的译者,陆续择要译。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16年3月

## 中译本前言

孔新峰

沃格林既是政治思想史家，亦是政治哲学家，或者说，他首先是政治哲学家，其次才是政治思想史家。这就使得其政治思想史撰述（哪怕是“早期”的《政治观念史稿》），本身即具有鲜明的政治哲学色彩。

沃格林是做判断的，在此（撰述《政治观念史稿》）过程中，一种政治哲学由以产生。……《政治观念史稿》提供了一套在某种哲学观点与信息指导之下的叙事。<sup>①</sup>

就此而言，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撰述，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代性批判特质。

带着沃格林这种现代政治批判的眼光审视《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我们就不能将视野仅仅限制在该卷，而应该至少通观《政治观念史稿》第3、4、5三卷。换言之，

---

<sup>①</sup> Jene M. Porter, "The Birth of Modernit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2, No. 4 (Autumn 2000), p. 799.

我们应当将该卷与其前后两卷统而观之,庶几可以得出现代政治何以产生的精准认知。例如,举凡沃格林所认知的现代政治的主要特质——对超越及历史实存的封闭隔绝(the closure to transcendence and historical existence)、渗透此世的理性(intramundane reason)的高扬、智识上的倨傲(intellectual hubris)、灵知主义与将世界转化为完美者共同体(a community of the perfected)的企图、属世与属灵权威之间统一性(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unity)的断裂,等等,均在本卷和第5卷对基督教教派运动特别是诸种千禧年主义运动的讨论和批判之中,以及在对于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谟及博丹等人政治观念的批判之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阐发。<sup>①</sup>

《政治观念史稿》3、4、5这三卷所涵盖的时段,大致为14世纪—16世纪的三百年。除了被广泛认为现代政治思想最重要奠基者的霍布斯在《政治观念史稿(卷六):革命与新科学》得到(权重不大的)讨论外,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三卷堪称沃格林对于古今政治观念之“转型”(transition)叙事的集中阐发。同时,沃格林的古今政治观念之“转型三百年”叙事,较之略为“非历史”的施特劳斯学派以及过分倚重历史的剑桥学派而言,可以说兼具其所长,而叙事的复杂程度却有过之无不及。

本卷凡四章,分别讨论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谟及莫尔、引致宗教改革主体的诸种精神教派运动,以及路德与加尔文。本卷紧承《政治观念史稿》第3卷《中世纪晚期》后半部分所探讨的“神圣帝国”或曰“帝国基督教”的崩解,阐发在其丧失吸纳力

---

<sup>①</sup> 关于《政治观念史稿》卷八第9部分与《秩序与历史》诸卷文本脉络上的对应关系,可参见 John A. Kromkowski,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Recovering the Text and Discovering Eric Voegelin as Teacher",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2, No. 4 (Autumn, 2000), pp. 777—793,特别是第784页的对应图。

(absorptiveness)之后,中世纪政治社会结构迸发出的强大势能,呈现为诸种教派反叛和乞灵于权力或所谓自主理性(autonomous reason)秩序的恢弘壮阔的智识图景,规定和奠定了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之于中古的“万劫不复”的优胜地位。

关于本卷的主要文本脉络和思想价值,莫尔斯和汤普逊撰写的“英文版编者导言”所言备矣至矣,译者在此不做赘言。译者在此处仅就这一时段特别是副标题所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政治思想史形象,<sup>①</sup>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庶几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进入这一渊博而颇为艰深的著作。

从历史时段而言,本卷大致涵盖了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初期。英国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史家芬纳(Samuel Finer)的观察,可谓与本卷主旨殊途同归——“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作为单一实体存在的最后的日子”。<sup>②</sup>

16世纪是欧洲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并且经由欧洲,也成为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因为欧洲是现代国家的诞生地。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新发展,而这些发展之间互相促进。<sup>③</sup>

---

① 这种形象,可能更多地还是基于一种自由主义的“进步”历史编纂叙事方式。读者若将其与沃格林的对抗式叙事相对照,当别有一番趣味。需要说明的是,后文部分内容源自笔者与中国人民大学陈伟教授合著的《政治学的故事》(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中自撰部分。

② 瑞安,《论政治(上卷):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87页。

③ 芬纳,《统治史(卷三):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芬纳列举的“新发展”，“首先是两个支配性的机构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另外一个为教廷”，前者“成为一个贵族联盟”，后者的“普世性被打破”，两者“联合起来，为各国的国王创造了条件，他们因此声称不受皇帝和教廷制约，拥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主权独立’”。此外，“还有两个新发展让16世纪成为历史的转折点，那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前者将世俗化精神引入国家事务”，非宗教人士取代教士，中世纪自然法概念被抛弃，“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初露端倪；后者“把此前主要是教会特权的神圣光环转移到了世俗统治者身上；把人们的敬意从圣徒的道德转移到公民的道德；把他们的理想从修道院生活转移到家庭生活”，使“‘君权神授’的思想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意义”。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者结合，形成一种“爆炸性的力量”：

打破了在过去1300年里，传统的拉丁基督教对欧洲人的精神垄断，以一种反文化、反传统的姿态，对其发起挑战，以宗教上的特殊主义取代教会的普世主义，抛弃了天主教的超俗和神圣，转而追求此时今生、人文主义和希腊罗马时代充满肉欲的异教世界。

这种“发生在欧洲的反传统的骚动推翻了人们所熟知的所有旧观念，为世俗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尤其是为科学思想和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正是后者使欧洲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与上述政治和文化上的断裂相伴生的，还有几个“相关联的新发展”，亦即“军事封建制度的崩溃”、“商业交换、货币经济、借贷公司和国际银行家的兴起”、“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飞速向

前发展”以及古登堡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这些新变化无不“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面貌”。<sup>①</sup>

西罗马帝国衰亡后近千年,古典西方文明大厦的整个建构被动摇而最后崩塌,西欧的知性生活已陷入漫长的黑夜之中。20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撰有《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以咏叹调般的语言感慨中世纪相对于古典时代之“斯文扫地”,更以细腻的笔触暗示西方文明的浴火重生:

但这种沉沦或可比为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Antaeus),每次他只要被击倒在地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新的能量。毫无疑问,如果某位古希腊罗马作家从中世纪修道院收藏的羊皮手稿中突然醒来而环顾加洛林时代的世界,他一定会大惑不解,乡间修道院特有的粪土气息更会把他熏得昏过去。但不消说没有一个古希腊罗马作家会出现在加洛林时代。像整个古典文明一样,他们已进入长期的冬眠状态,被埋在一个已再度农村化的经济之下。即使当封建社会开始出现抒情民谣和骑士比武之时,古典仍未苏醒。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了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只有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于使市民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时,只有当封建时代加诸人的内外枷锁都被打破时,只有这时,古典巨人才能像安泰俄斯一样重获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获新生。<sup>②</sup>

① 芬纳:《统治史(卷三)》,前揭,第218—222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甘阳译),收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选编,甘阳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引文出自第32—33页。

韦伯所言的“新生”时刻，大致可对应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就政治学而言，这是一个大变迁的年代，所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罗马法的再发现”可谓奠定近代政治基础的三大运动，其相应英文名称开头字母都是“R”，一般合称为“3R运动”。尤其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分别将“人”本身从种种外在禁锢——神权的、教会的、封建领主的——解放出来，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现代国家也从罗马帝国、中世纪神权政体及形形色色的封建小邦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用德国社会与政治理论家基尔克(Otto von Gierke)的经典判断言之，则是：

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行将稳步成为两条核心公理，所有社会结构理论由以生发，而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将成为所有理论聚讼的焦点所系。<sup>①</sup>

英国现代政治学者米洛格(Kenneth Minogue)则以相似的语言表述了基尔克的思想：

现代国家的政治发源于两种对立的运动：国家一方面以某种方式走向分裂，另一方面又以别的方式走向统一。中央集权的君主获得了集中的王权，但与此同时个人和既有的阶级也会设法巩固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有的权益就被纳入称作“权利”(rights)的一系列新词汇中。<sup>②</sup>

① Otto von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 (translated by F. W. Mait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0, p.87.

② 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龚人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芬纳同样指出：

从领土上讲，中世纪的国家是被分化的，相对而言，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功能却统一在同一个职位或个人身上。现代国家与此恰恰相反，原本被分化的领土被连接在一起，其人口也被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统治机构之下。与此同时，公共权责和私人权责之间的界限早已被明确下来，同样，公职人员和私人个体之间的界限也得以确定。

从统一的服务到分化的服务，从分化的领土到统一的领土，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构成了“现代欧洲国家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于1450年左右从大西洋沿岸国家开始。它和领土面积的扩大、世俗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专业化都密切相关。<sup>①</sup>

个人与国家、权利与权力，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政治的锁钥。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伟大之处，莫过于奠定了一整套现代政治的基本性格。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著名学者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成名之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厚厚两大卷、洋洋百万言，便分别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为题名和考察对象。

在政治领域，人的主体地位被空前高扬，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的探究精神也开始深入政治思索。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此时已出现“作为艺术工作(Work

<sup>①</sup> [英]芬纳：《统治史(卷三)：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前揭，第222—223页。

of Art)的国家”或者说“作为人造物的国家”。本卷所论的马基雅维利,正是从“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走向“统治者地位/国家”(lo stato)这一关键转变的始作俑者。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沃林(Sheldon Wolin)曾经指出:(西方)古典世界向有所谓“灵修之道”(soul-craft)与“治国之道”(statecraft)的联结,而马基雅维利便是这一联结传统的终结者。<sup>①</sup> 马基雅维利由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米诺格所言的那种“新兴政治”:

新型政治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城邦,那里的市民共和制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僭主的政治——这些精于谋略的投机家运用不受制约的权力维持了和平。中世纪的君王是上帝认可的神授帝王,其权威和宗教地位都是比较稳固的。与中世纪君主相比,意大利的领主(signore)就不得不处处提防,谨小慎微了。他的同志不稳固,本国有权势的家族若与邻国公开或暗中勾结,随时都可能将他推翻。此时出现了“治国术”(statecraft,有人这样称呼新型的政治),它把传统的对正义的关注变成了一种表面文章,而将心思全部转向了如何掌握权力而不问是非。如何掌权一直是传统的治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通常只是一个从属的部分。这样的君王现在已经完全沉湎于“谋略”之中,而谋略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如何运用管理手段使得臣民效忠于君王的利益。……现在政治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至少新在它被彻底地理论化了。<sup>②</sup>

① 参见[美]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② 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前揭,第36—37页。

端赖于“自然”科学精神的萌发，

政治、立法和公共经济，还都不是科学；人们还根本没有从事探索、钻研和发挥它们的原则，但是人们已经在开始用经验来阐释它们，积累了由经验可能导致的种种观察；人们已经认识到利益使得他们感到有此需要。<sup>①</sup>

当然，文艺复兴乃是一场遍布全欧的文化运动。其影响不仅限于意大利，尚有相对于意大利的“北方”欧洲的文艺复兴进程，包括英、法、尼德兰（荷兰）等国在内。也涌现出众多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新型政治观念产生居功至伟。

本卷所论的伊拉斯谟(Erasmus, 约 1466—1536)原名格哈德·格哈德斯，是尼德兰人文主义者。他出生在鹿特丹穷人家庭，后成为教士，游历各地。他拥有出色的写作才能，在嬉笑怒骂间痛斥时弊，说“基督教教廷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用血来巩固的”。他开始公开写小册子，于是世人被一组匿名书信逗得忍俊不禁了。这组书信刚刚面世，题目是《蒙昧者书简》。在这些书信中，中世纪晚期僧侣阶层中普遍存在的愚昧、傲慢，被用一种奇怪的德语—拉丁语打油诗的形式，揭露了出来，读起来就像我们当代的打油诗。他首先还是一位极渊博、严肃的学者，通晓拉丁语、希腊语，给后世提供了第一个可靠的《新约》版本，将《新约》翻译成拉丁文，并对原来的希腊文本进行了校对。其深远影响，则会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清晰地体现出来。若是 16 世纪也有畅销书排行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稳居榜首的 bestseller，肯定是伊拉斯谟的《愚人颂》(Encomium

<sup>①</sup> 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前揭，第 36—37 页。

Moriae)！他以第一人称，运用幽默这种最危险的武器攻击教会弊政，吁求人们促成基督教文明的伟大再生。“愚人颂”其实是“愚神颂”！更厉害的是，这本小书是伊氏远赴英格兰造访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时，用几星期时间匆匆写就的，题名“愚人”的希腊文读音与“莫尔”十分相像，序言则是他写给莫尔的一封信，信中说：“对不起，我用你的名字作了我这本书的书名。”<sup>①</sup>

引得名贯士林的伊拉斯谟“飘洋过海来看你”，还写书唱和、幽其一默，这位莫尔是位了得的人物。他留给后世的传奇，除了为英王亨利八世所杀之外，就是大名鼎鼎的《乌托邦》了。1478年2月7日，莫尔生于伦敦，家境宽裕，“名声虽然不大，却是一个正直的家庭”。作为法官，他在法律界以出色的品格和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人格而闻名。“无论谁也没有像莫尔那样审理过这么多的案件，无论谁也没有比他更为光明磊落地审理这些案件。”“赢得了同胞们的最大爱戴。”1504年，26岁的莫尔当选下院议员，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后历任要职，1523年当选下院议长，1529年被国王任命为大法官。但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及离婚事件引起了莫尔的异议，遂于1532年去职，1534年入狱，1535年7月6日以“叛国罪”被处以极刑！虽然天妒英才，毕竟山高水长，在其死后400年的1935年，被世人追谥为圣徒。由于《乌托邦》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其英名还曾被镌入前苏联莫斯科红场石碑上的“革命英雄”名单。

“乌托邦”标题最早出现在1516年11月12日莫尔写给伊

① 参见[奥地利]茨威格：《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姜瑞璋等译，许崇信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荷]伊拉斯谟：《愚人颂》，许崇信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